

中小学考试管理改革政策的逻辑理路、现实梗阻与实施路径

龙瑞娜, 康 芳

宁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宁夏 银川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13日

摘 要

中小学考试管理新政是深化双减改革、重构教育评价生态的关键举措。本文基于政策过程理论, 系统剖析该政策的生成逻辑、现实问题与实施路径。研究发现, 新政遵循“价值纠偏 - 问题回应 - 系统调适”三重逻辑, 旨在破除唯分数倾向、减轻学业负担过重困境, 并以考试管理改革撬动育人方式整体转型。然而, 政策执行仍面临多重现实问题, 分数至上观念根深蒂固, 学校和教师在命题与过程评价方面存在能力短板, 协同治理机制不健全, 区域资源不均可能加剧隐性焦虑。为推进政策有效落地, 应构建全链条、全过程、多主体的实施体系, 具体包括: 健全“目标 - 责任 - 反馈”管理闭环, 强化素养导向的考试命题与过程性评价, 开展教师评价能力专项支持, 并推动形成政府、学校、教师、家长与社会协同联动的育人格局。本研究试图为理解考试管理改革的深层逻辑、摆脱其执行困境提供整合性分析视角与行动参考。

关键词

中小学考试管理, 教育评价改革, 协同治理, 素养导向

The Logical Rationale, Practical Obstacle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of the Examination Management Reform Policy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Ruina Long, Fang Kang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 Ningxia University, Yinchuan Ningxia

Received: June 5, 2026; accepted: July 6, 2026; published: July 13, 2026

文章引用: 龙瑞娜, 康芳. 中小学考试管理改革政策的逻辑理路、现实梗阻与实施路径[J]. 教育进展, 2026, 16(7): 368-377. DOI: 10.12677/ae.2026.1671378

Abstract

The newly reformed examination management policy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constitutes a pivotal measure for deepening the “Double Reduction” reform and reconstructing the educational evaluation ecosystem. Drawing on policy process theory,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policy’s generative logic,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new policy follows a triple logic of “value correction - problem response - systematic adjustment”, aiming to eradicate the score-centric tendency, alleviate excessive academic burden, and leverage examination management reform to drive a holist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educational paradigm. Nevertheless, policy implementation faces multiple practical obstacles: the deeply entrenched “score supremacy” mindset, capacity deficiencies among schools and teachers in test design and process-oriented assessment, inadequat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s, and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resources that may exacerbate implicit anxiety. To facilitate eff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 integrated “whole-chain, whole-process, multi-actor” implementation framework should be established. This includes: refining a closed-loop management system of “goal-responsibility-feedback”, strengthening competency-based test design and formative assessment, providing targeted support for teacher assessment capacity, and fostering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ecosystem involving government, schools, teachers, parents, and society at large.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an integrated analytical perspective and actionable refer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deep logic of examination management reform and overcoming its implementation dilemmas.

Keywords

Examination Management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Educational Evaluation Reform,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Competency Orient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随着双减改革进入深化攻坚阶段,我国基础教育正经历一场从规模扩张向内涵发展的系统性转型。作为教育生态的指挥棒,考试评价改革的方向直接关系到减负提质根本目标的实现。为此,教育部办公厅于2025年12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日常考试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1],旨在通过系统规范日常考试管理,推动教育评价回归育人本位[2]。然而,政策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历史经验表明,减负政策长期面临“工具结构失衡、参与主体不均”[3]等执行困境。然而,在唯分数的顽固应试生态中,这项旨在推动评价范式转型的《通知》,自颁布之初便面临着一个核心矛盾:其先进的“育人本位”理念与系统性、结构性的现实执行环境之间的巨大张力。来自观念认知、实施能力、制度协同及利益格局的多维梗阻,构成了政策落地的现实挑战。

现有研究虽为政策探讨提供了重要基础,但大多聚焦于双减政策实施成效的评估或对考试改革的泛化呼吁,尚未构建起贯通“政策生成逻辑-执行深层梗阻-系统化实践”的整合性分析框架。特别是针对此次专项“新政”,学界仍缺乏从制度变迁与系统演化视角出发的理论透视。事实上,由于考试立法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教育考试立法长期处于悬而未决状态,正是制度供给不足与执行机制滞后并存的典型体现[4]。刘太刚等(2022)基于需求溢出理论的分析表明,政策执行阻力根源于多元主体差异化需求所

构筑的“动力传递链”[5]。由此可见，若仅孤立审视考试管理改革，难以触及深层次矛盾，必须将其置于价值重构、权力再配置与系统协同交织的复杂制度变迁进程中加以整体把握。

基于此，本研究试图突破单一视角，遵循因果机制的分析逻辑，整合制度变迁[6]、系统论[7]与协同治理理论[8]，构建了“逻辑理路－现实梗阻－协同路径”的整合性分析框架。首先，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剖析新政背后“价值纠偏－系统调适”的深层逻辑；其次，结合系统论，前瞻性诊断其落地可能面临的观念、能力与制度协同等多维梗阻；最后，依托协同治理理论，探索构建多主体、全链条的协同实施路径。本研究旨在通过构建并运用这一整合框架，为解析教育评价领域的复杂政策变迁提供一个动态的系统分析工具，并为破解执行梗阻、构建协同推进机制提供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参照的学理支撑。

2. 政策的结构化梳理：分析要素的整合与呈现

2025 年 12 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日常考试管理的通知》，旨在对中小学日常考试实施系统性、全链条的治理。为服务于后续“逻辑理路－现实梗阻－协同路径”的整合分析框架，本文首先对政策内容进行结构化梳理，提炼出功能与价值重构、系统与权责配置、操作与保障规范三大核心维度。下表(表 1)以此为分析基础，分别呈现各维度所体现的政策逻辑、所回应的现实困境以及所提供的制度工具，清晰地揭示新政所构想的应然治理图景，为后续理论探讨提供基础支撑。

Table 1. Core dimensions of the notice on daily examination management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表 1. 中小学日常考试管理通知的核心维度梳理

分析要素	政策彰显的价值与逻辑 (对应“逻辑理路”分析)	政策意图破解的原有困境 (历史背景与改革起点)	政策提供的关键工具与规范 (为“协同路径”提供制度基础)
功能与价值 重构	确立考试的诊断与发展功能，推动评价从筛选排名回归育人本位。	唯分数倾向严重，考试结果被过度用于排名、施压，导致功能异化，加重学生负担。	推行等级评价，禁止排名公布；强调命题的素养立意与应用性。
系统与权责 配置	构建“省级统筹－市县监管－学校执行－教研支撑”的多层协同治理体系，明确各方责任边界。	管理松散，权责不清，监督缺位，导致考试频次、命题质量失范。	明确省、市、县、校四级管理职责；强化教研机构专业支撑角色。
操作与保障 规范	通过标准化、专业化与技术赋能，提升考试管理的科学性与规范性。	命题质量参差，审核流于形式，教师命题能力不足，违规行为缺乏有效制约。	建立命审分离、多人审核机制；要求加强培训并利用智慧教育平台；建立监督举报与问责机制。

3. 中小学日常考试管理政策的逻辑理路：一个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

新政出台本质上是制度系统的演化与重构。2025 年《通知》的出台，并非一次孤立的管理调整，而是中国基础教育评价领域一场深刻的制度变迁。为系统阐释其内在机理，本节以制度变迁理论为统领性分析框架，将其生成与演进置于“制度失衡－蓝图构建－变迁路径”的三阶段模型中予以系统性阐释。在此过程中，有机融入系统论以剖析旧制度的生态锁定，运用价值理性视角阐释新蓝图的核心价值，并引入协同治理理论以阐明新制度的实施逻辑，从而构建一个制度变迁为纲，多元理论为用的整合性分析理路。

3.1. 旧制度失衡：分数驱动系统的生态锁定与合法性危机

制度变迁往往源于既有制度安排难以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导致功能失调与合法性下降，进而陷入

制度失衡的困境[7]。我国中小学日常考试长期实行以分数为核心、以筛选为导向的考试制度。从系统论或生态学视角审视,该制度已深陷于各子系统相互强化、自我维系的闭环结构之中:考试子系统持续输出可量化的成绩数据;管理子系统则将分数作为唯一依据,用于学生分层、教师考核与学校排名;而这种高利害性的评价机制又反向驱动教学与学习子系统不断加码考试频率与难度,催生出以应试为中心的稳定格局。这种根植于路径依赖的生态锁定,在短期内看似提升了管理效率与选拔明晰度,实则制造了一种效率幻象;其长期运行累积了深刻的系统性危机。具体体现为,教育评价功能从诊断发展异化为管理筛选[9],进而催生出机械灌输、抑制创新、加重焦虑等广泛的负效应,最终与发展素质教育、培养创新人才的国家战略要求相冲突,导致其制度合法性严重流失。因此,《通知》的发布并非偶然的政策调整,而是对既有考试制度长期失衡与路径锁定的必然矫正,标志着决策层力图通过关键制度要素的重构,打破陈旧模式的惯性,推动教育评价体系迈向系统性转型。

3.2. 新制度蓝图:以价值理性为内核的诊断型评价重塑

面对旧制度的失衡,变迁的核心在于提出一套能够解决既有矛盾、并获得广泛认同的新制度[7]。2025年《通知》的核心贡献,正是清晰地勾勒了这一蓝图。韦伯强调人在实践活动中对自身价值和存在意义的体认、追求和建构[10]。作为育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评价的主体和对象是具体的人,其根本旨归也必然指向人的培养和发展,不仅是对学生学习成果的衡量,也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9]。因此,2025年《通知》的本质,乃是一场以价值理性为内核,对考试功能与形态进行的系统性制度重构。其通过以下三个层面的规则再定义,为诊断性评价这一新制度逻辑提供了操作化内核,推动了考试功能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回归。

首先,功能重定位:明确将日常考试界定为“检验学生阶段性学习效果、服务于教学改进”[1]的活动。这一定位在制度层面将考试与排名、选拔进行了解耦,重新锚定其教育属性,体现了价值理性对教育过程内在价值的尊重,即将学生视为“目的”而非“手段”。其次,规则再设计:“压减频次”、“等级评价”、“不排名不公布”[1]等具体规定,旨在从操作层面斩断分数与外部比较、管理的直接链条,迫使实践场域将注意力从区分转向理解与支持。最后,目标再引导:强调对“增值表现、潜在能力”[1]的分析,推进“教、学、评有机统一”[1],旨在建立一套以学生全面发展与个性成长为导向的新激励信号。该蓝图立足于教育育人本质,以理解、支持与成长为内核,重构教育评价制度,使其成为激发个体发展的“助推器”。这不仅是技术改进,更是价值理性引导下的深层变革,既为新制度奠定了合法性基础,也为其树立了清晰的演进路标。

3.3. 变迁路径选择:以协同治理推进的渐进式制度杠杆

新制度蓝图的实现,必然面临旧有路径依赖的强大阻力。这意味着,制度变迁必须选择现实的实践路径,以化解阻力、累积动力。新政展现出一条清晰的策略,以“规范日常考试”为关键制度杠杆,采取渐进式试点与协同性推进相结合的复合路径。

首先,这一路径体现了渐进式改革的策略理性。相较于直接撼动中考、高考等高利害终结性评价,规范非毕业年级的日常考试,触及的利益格局相对简单,改革阻力和风险更可控。此举旨在通过在日常教学的核心环节率先植入新规则,潜移默化地重塑教师与学生的行为体验,从而为整个评价体系的变革积累宝贵的微观动力与局部合法性。其次,与渐进策略相匹配的,是一个明确的协同治理框架构建。新政所明确的“省级统筹、市县监管、学校执行、教研支撑、社会监督”体系,实质上是在构建一个推动制度变迁的多层级、多主体行动者网络。该网络试图通过清晰的责权分解、资源整合与监督反馈机制,将政府、学校、教师、学生、家长及社会等多元力量转化为改革合力。政策中对管理、命题、评价、问责的

全链条规范, 可视为嵌入旧制度生态的一系列“新制度元件”。

总之, 新政的路径选择是一种务实的系统杠杆: 在阻力较小的局部领域(日常考试)率先确立新规则的约束力与示范效应, 并依托协同治理网络保障其运行。其最终目的, 是以此“杠杆支点”引发教学、学习、管理等关联系统的适应性调整, 逐步撬动整个教育评价生态的渐进式转型。然而, 这一精巧设计的杠杆能否真正撬动坚固的路径依赖, 仍取决于其能否有效应对接下来将探讨的观念、能力与系统协同等多维现实梗阻。

4. 新政执行面临的现实问题与深层梗阻

新政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的推进过程中, 主要面临三重阻力: 唯分数文化惯性与路径依赖构成的价值认知梗阻; 教师命题与评价能力短板、区域资源不均导致的能力资源梗阻; 评价体系内部“前端松散”与“终端收紧”的制度冲突, 以及协同治理网络缺失引发的系统协同梗阻。

4.1. 认知与观念梗阻: 唯分数评价文化的路径依赖

新政所推动的评价文化转型, 在进入执行阶段时, 将首先遭遇唯分数观念的深层路径依赖。刘海峰等人, 对“唯分数”与“唯升学”问题进行历史探究, 发现“唯分数”、“唯升学”问题不仅是当代出现的问题, 而且是中国人才选拔中的千古难题[11]。这一认知惯性的顽固性, 根植于其长期作为社会评价“通用货币”的角色。在教学管理中, 分数是考查学生学习成绩的一项重要指标, 不仅被视为客观高效的测量工具[12], 更被异化为关乎学生前途与社会流动的关键凭证, 成为家长感知教育“安全性”的直接依据, 也构成了部分教育工作者惯性依赖的管理基础。更深层的梗阻, 源于对政策意图误读而引发的文化心理抵触。例如, 将压减考试简单理解为放任教育, 本质上反映了将竞争强度与教育质量错误等同的思维定势。若此类观念无法疏解, 还可能在实践中催生策略性规避行为, 如学校通过隐性手段维持分层, 或将竞争压力转移至课外培训等非正式渠道。因此, 认知范式的转变成为改革进程中基础且艰巨的环节, 其成败关键在于能否与根深蒂固的观念惯性展开持续对话, 并推动渐进性的观念重塑。

4.2. 能力与资源梗阻: 关键行动主体的专业短板与配置不均

新政所倡导的诊断式评价转型, 在实践层面直指教师、学校与区域系统在专业能力与资源配置上的结构性短板。这些短板构成了政策落地的刚性约束。

其一, 教师在命题与评价能力方面面临双重困境。在命题层面, 亟需从传统的知识再现转向素养诊断, 设计融合知识考查与思维评估的情境化试题, 实现新课标理念下的“深度学习”[13]。这对多数教师而言是一项全新的专业挑战。在评价层面, 随着纸笔测试比重下降, 学业评价倾向于主观、模糊的依据, 缺乏大量系统性、过程性、客观性数据支持[14]。如何有效运用课堂观察、项目成果等多元数据开展科学、系统的过程性评价, 成为普遍短板。教师既缺乏系统的理论方法, 也缺少实践经验, 容易回归传统单一评价模式或陷入主观随意。

其二, 学校在构建校本评价体系方面缺乏相应的组织能力。建立科学且可操作的校本多元评价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要求管理者具备评价理念引领、课程整体规划以及技术整合等综合领导力。然而现实中, 许多学校长期处于被动执行状态, 过度依赖上级指令和标准化测评工具, 其评价实践本质上是为应对外部考核而进行的形式化自评[15], 在自主开发、持续优化校本评价方案方面既无积累, 也无支撑, 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评价变革。

其三, 区域间优质支持资源分布不均容易引发新的教育鸿沟。专业的教研指导、高质量的命题资源库、支持过程性评价的数字化平台等关键资源, 在城乡之间、校际之间的配置差异显著。这可能导致资源优越的学校率先完成评价转型, 而薄弱学校因缺乏必要支持, 将减少考试误读为弱化评价, 造成评价

功能的空心化,进而拉大教育质量差距。因此,能力建设与资源供给的公平性,已成为决定教育评价改革能否纵深推进的核心前提。

4.3. 制度与协同梗阻: 新旧体系衔接冲突与治理网络缺失

新政的深层执行困境,根植于教育系统的结构性制度矛盾与协同治理网络的系统性缺失。这一梗阻在三个层面相互强化,构成了改革的坚固壁垒。其一,最根本的梗阻在于评价体系内部“前端”与“终端”之间的深层矛盾。新政力图将日常考试转变为过程性诊断手段,但教育系统的终端依然由中考、高考等高利害的终结性选拔机制主导。这种前端松绑、终端收紧的结构性张力,使学校、教师和学生陷入两种逻辑相互冲突的困境之中。若终端选拔标准未变,前端的去分数化改革极易被虚化为软性要求,甚至催生表面素质教育、暗中应试备战的双轨运行模式,严重削弱改革的实际成效。

其二,在此结构性矛盾之下,中观层面的协同育人体系面临机制性缺失。新政成功有赖于家校社的共识与合力。但当前的协同多停留于理念与活动,长效的沟通渠道、共商平台与责任边界普遍缺位。信息不对称与专业认知不足,易使家长对改革产生疑虑,而学校也缺乏引导家庭的系统策略。由此,共识难以达成,政策推进的合力亦难以形成。

其三,微观执行层面的监督与问责机制薄弱,进一步助长了机会主义行为,侵蚀改革生态。面对“阴阳课表”、“变相考试”等隐性违规策略,现有督导体系在识别精准性、反应及时性与处罚有效性上均面临挑战。此类监管失灵不仅削弱一线执行者的积极性,还可能诱发“劣币驱逐良币”的负面效应,最终动摇政策的公信力与权威性。因此,破解执行梗阻的关键在于构建一套与新型评价理念相契合、有效弥合制度张力、整合多元治理主体并具备刚性约束力的协同治理与监督体系。

5. 推动新政落地的系统性实施路径

面对当前考试管理改革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治理碎片化、实施技术化与协同形式化等倾向,亟需明确各类管理工具的应用边界,强化系统思维与协同治理对改革的整体引领作用,在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统一规范与校本特色、行政推动与多元共治之间实现动态平衡,重构考试管理改革的实施逻辑。基于此,日常考试的功能回归绝非孤立的环节调整,而是一场涵盖理念更新、结构优化、技术升级与文化重塑的系统性治理变革。从治理协同、评价转型、专业支持、主体参与和生态营造五个维度协同推进,将以评促发展的核心理念转化为可操作、可监测、可迭代的实践路径,有效破解改革中的关键梗阻,推动改革稳健落地。

5.1. 强化顶层统筹与系统整合的战略引领

新政的落地,绝非孤立的技术调整或局部改良,而是一场关涉教育评价范式转换的深刻变革。为确保改革行稳致远,必须突破单一工具理性的局限,在顶层设计中强化战略统筹与系统协同,将治理体系重构、评价机制转型、教师专业发展以及多元主体共治等关键要素有机整合,形成目标一致、协同联动的整体行动框架。

首先,需在更高战略坐标系中锚定改革方位。应将日常考试管理改革深度融入双减攻坚进程和《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16]的总体布局,明确《通知》作为撬动育人方式整体变革、服务创新人才培养国家战略的关键支点。这要求决策者与执行者均具备全局视野和战略自觉,超越“为改考试而改考试”的狭隘视角转向以立德树人为核心、以长远发展为导向的系统性改革思维。

其次,以系统思维统筹推进多维改革举措的协同联动。必须深刻认识到,闭环治理体系是改革的“骨架”,素养评价转型是改革的“引擎”,教师专业发展是改革的“基石”,多元监测共治则是改革的“免疫系统”。四者相互依存、有机联动,任何一环的滞后或脱节都将削弱整体改革效能。因此,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应建立跨领域、跨层级的协同机制,确保举措同频共振,形成合力。

最后, 应着力推进长效机制与法治保障体系建设。为巩固改革成果、防止反弹, 应及时将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管理规范和评价理念上升为地方性法规或部门规章, 切实弥合政策与法律之间的间隙。通过法治化路径, 把“减负提质、素养导向”的核心理念转化为制度预期, 为教育评价生态的持续优化筑牢坚实的制度根基。

5.2. 构建“权责 - 协同 - 监督”的闭环治理体系

确保教育评价活动避免沦为行政指令的机械执行或技术工具的简单附庸, 回归教育评价促进学生发展的育人本质, 构建一个权责清晰、协同顺畅、监督有力的治理体系至关重要。力求将“减负提质、素养导向”的理念, 转化为一种尊重规律、充满活力且可问责的制度实践。

一是纵向压实行政传导链条, 厘清“四级”主体责任。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强化统筹领导职能, 牵头制定区域考试管理方案与评估标准市级部门履行直接监管职责, 督导政策执行。县级部门协同学校作为终端执行主体, 须健全校内管理机制, 落实考试计划公示与备案制度。通过建立“谁主管、谁负责”的责任清单并与考核挂钩, 切实防止责任空转与政策落空。

二是横向构建社会支持网络, 拓展实践育人协同路径。为有效破解唯分数、唯考试困局, 教育部门应主动联动文旅、科技、共青团、社区及企事业单位, 同搭建常态化的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平台, 整体规划研学旅行、科学探究、公益服务等实践项目。通过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与资源供给清单, 促进知识应用与社会体验的深度融合, 为学生核心素养发展创设真实、多元的成长场景。

三是强化监督问责机制, 筑牢制度“防火墙”。坚决整治“阴阳课程表”、变相考试、违规联考等隐形变异问题, 整合教育督导、市场监管和纪检监察多方力量, 畅通群众举报渠道, 健全快速核查、公开通报和严肃问责的闭环管理机制。通过专项督导与随机抽查相结合, 形成持续高压态势, 净化教育生态。

四是着力引导社会预期, 构建“家校社”育人共同体[17]。学校与社区应依托家长学校、政策宣讲、线上专栏等多种形式, 准确传递双减政策初衷和学生全面发展理念, 提供科学有效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缓解公众焦虑, 凝聚“成长重于成绩”的社会共识, 为改革营造稳定的心理与文化环境。

为将家校社协同共治的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 有必要构建常态化的家校沟通议事机制。下表(表2)展示了家校社协同育人议事委员会运作规程。

Table 2. Operating procedures of the home-school-community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deliberative committee
表 2. 家校社协同育人议事委员会运作规程

步骤	具体操作	主要参与方
成立	学校主导, 吸纳家长代表(班级推荐、年级推选)、社区代表(属地社区指定或委派)、教育督导员等组成议事委员会。每学期初召开首次全体会议。	学校、家长代表、社区代表、教育督导员
议题收集	建立“议题池”机制, 收集来自学校管理层(如考试计划公示)、家委会(家长意见)、学生代表(如学业负担感受)、社区观察等渠道的议题。	学校管理层、家委会、学生代表、社区
议题分类	将收集到的议题分为“考试评价类”(如考试频次、命题质量、评价方式)、“作业管理类”(如作业公示、分层作业)、“实践活动类”(如研学安排、社区服务)等。	议事委员会(分类整理)
协商议事	针对具体议题, 由学校召集专题会议, 邀请相关学科教师、家长代表、社区负责人共同协商, 通过多方听证、方案论证、民主表决等方式形成决议。	学校、相关学科教师、家长代表、社区负责人
执行反馈	学校根据决议制定或调整具体措施, 并将结果在下次议事会议上通报, 同时通过家长通报、社区公示等渠道接受监督。	学校、议事委员会、全体家长及社区成员

以“考试结果呈现方式”为例：若家长对等级评价的具体标准存在疑虑，可由议事委员会召集专题协商，学校解释等级划分依据及与分数评价的本质区别，家长代表反馈子女的真实体验，共同探讨更为透明、易懂的等级评价说明方式。这一机制旨在通过制度化的对话平台，使政策意图从“单向传达”转化为“双向共建”，有效破解信息不对称与观念冲突导致的执行阻力。

5.3. 推动素养导向的评价模式与技术赋能

为推动育人理念从知识考核向素养发展转变，亟需突破以分数为核心的单一评价模式，构建指向核心素养、形式多元、过程动态且反馈及时的新型评价体系。首先，依托智能技术丰富评价形式，实现作业分层与学习个性化。充分融合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赋能教学评价全过程。教师可依据精准的学情分析，设计多元化、可选择、分层次的作业与探究任务。通过智慧作业平台，智能推送涵盖基础巩固、拓展应用与创新挑战等不同层级的内容，减少机械重复练习，使每个学生都能在适配的挑战中获得成长。评价应超越结果，注重考察学生在项目报告、实验操作、艺术创作等表现性任务中所体现的思维深度、探究精神与实践能力。

其次，强化在真实情境中的实践与能力评价。大幅提升实践性、体验性活动在评价体系中的比重，将社区服务、项目式学习、社会调研等纳入课程实施与评价范畴。通过设计真实情境中的复杂任务，重点评估学生批判性思维、创新创造、团队协作与实际问题解决等关键能力。例如，在“社区环境改善”项目中，评价应覆盖从问题识别、方案构思到成果展示的全过程，推动知识学习向核心素养的有效转化。

最后，深化智能化诊断与反馈机制，构建“教-学-评”一体化闭环。依托国家和区域智慧教育平台，建立学生学业发展与核心素养成长数据库，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分析学习过程、描绘个体能力图谱。系统不仅诊断知识掌握情况，更能深度分析学生的学习策略、思维习惯及发展潜力，自动生成个性化分析报告与学习建议。智能反馈需同步至教师与家长，助力教师精准教学，引导家长科学育人，最终形成“以评促教、以评促学”^[1]的良性循环，真正实现三者的有机统一。

以语文学科为例，素养导向的命题设计可从“碎片化、去情境化”转向“主题引领、任务贯穿”的情境化整卷模式。有研究者以校园营养餐为情境背景，设计了一套任务链驱动的试题，学生在成语运用环节需将“司空见惯”“不可思议”等成语恰切地填入关于食堂浪费现象的演讲稿中；在食谱调查与计算环节提取菜品数据并进行分析；在倡议书写作环节补充劝说对话并完成正式倡议书的撰写^[18]。该套试题通过同一情境统摄多个语言实践任务，既考查了学生在真实场景中综合运用语文知识的能力，又将节约粮食的价值观教育自然融入其中，体现了学科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在物理学科方面，某市中考物理试题以“小明用独轮车帮助爸爸运送货物”为背景，引导学生运用杠杆平衡原理分析实际问题；另有试题以“神舟二十号太空会师”“嫦娥六号月球背面采集月壤”等真实科技事件为情境，将现代科技、传统文化与物理知识融合，在考查物理观念和科学思维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19]。这类命题创新表明，素养立意的考试设计并非简单的减量提质，而是要求命题者超越传统的知识再现型试题，在真实、有意义的任务情境中测量学生的综合素养水平。

5.4. 夯实教师专业发展与激励保障体系

教师是推动教育新政落地的关键力量与专业核心。要确保其在素养导向的教育教学转型中真正履职到位，亟需构建一个以专业发展为驱动、以减负与激励机制为支撑的系统性支持体系，充分激发教师的内生动力与创新潜能。

首要任务是系统化建设专业支持机制，精准提升教师关键能力。省、市教研机构应发挥引领作用，聚焦“命题、作业、评价”三大薄弱环节，开发模块化、阶梯式的专题研修课程与实践工作坊，重点强化

教师依据课程标准进行科学命题的能力、分层分类设计作业的水平, 以及有效运用过程性评价工具的专业素养。同时, 应加快建设并持续更新区域性的共享题库与优质教学资源库, 为教师提供可直接选用或适配的优质素材, 减轻其重复性备课与自主命题负担, 使其能将更多精力投入教学创新与学生个性化指导中。

同时, 必须扎实推进教师减负工作, 保障其专注于核心教学职责。应建立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的减负清单制度, 大幅压缩会议、检查、评比、报表填写等非教学事务。通过设立“无会日”、保障“静校教研”时间, 确保教师专注于课堂教学与专业反思。校本教研应切实转向课堂改进、作业优化、考试分析与学生发展诊断, 使教研活动真正成为支撑日常教学的专业常态。

改革教师评价与激励机制具有根本性的导向作用。学校及教育管理部门应将学生作业负担是否切实减轻、考试管理是否规范、学生综合素养是否有效提升等关键育人成效纳入教师考核体系, 推动评价重心从单一成绩向全面发展转变。设立“教学创新奖”“科学减负标兵”等专项荣誉与奖励机制, 对在评价改革、实践育人等方面取得实效的教师与团队给予表彰与激励, 营造崇尚“轻负高质”的良好教育生态。

此外, 需前瞻性拓展教师培训内容范畴。培训应超越学科知识教学, 纳入项目式学习指导、学生发展性心理辅导、家校沟通艺术及教育数据基础解读等内容, 旨在全面提升教师的综合育人能力, 助力教师真正成为学生成长的价值导师、问题导师和兴趣导师[20]。

5.5. 健全多元参与的监测评估与共识凝聚机制

为确保改革理念在复杂实践中真正落地, 避免流于形式, 亟需突破单一行政督导的局限, 构建集动态监测、独立评估与多元主体参与于一体的协同治理闭环。该机制旨在将政策执行置于真实、透明、可持续的监督与反馈之下, 凝聚社会共识, 形成育人合力。

首要任务是建立常态监管与突击检查相结合的动态监测机制, 打破政策执行中的“黑箱”。教育行政部门应牵头建设常态化监测平台, 定期通过不预先通知的匿名问卷、随机访谈与实地走访, 直接向学生与家长采集关于考试频次、作业负担及实践活动落实情况的真实反馈。这种“非预期性”监测能够有效防止应付检查的表面行为, 最大程度还原政策执行的真实状况, 为精准督导与动态调适提供实证依据。

其次, 积极引入独立专业的第三方评估力量, 打破教育系统内部评价的局限。可通过定期委托高校、专业研究机构, 并联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媒体代表组建独立观察团, 采取随堂听课、资料审查、深度访谈等多种方式, 对学校考试管理、作业设计以及实践育人等关键环节开展多维度、系统性评估。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开, 不仅有助于提升监督的透明度与公信力, 更能形成有效的外部倒逼机制, 促动学校持续规范办学行为。

最后, 系统性赋权学生, 使其从评价对象转变为共建主体。学校应建立常态化的“学业负担”听证会、作业设计意见征集等制度化渠道, 鼓励学生就作业内容、形式及课外活动提出建议。此举不仅能优化教学资源配置与育人举措, 更能在实践中增强学生的学习自主性与责任意识, 使评价本身成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过程, 切实推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落地见效。

6. 结束语

小学日常考试管理改革是一项涉及理念更新、制度创新与技术支撑的系统工程, 其推进过程中面临观念滞后、能力不足与体制壁垒等多重挑战。基于制度变迁与协同治理的整合性分析表明, 破解改革困境的关键在于超越碎片化的政策调整, 转向整体性、协同性的治理重构。这需要以价值理性为核心导向, 统筹推进权责明确的治理体系构建、素养本位的评价方式变革、教师专业发展的支持强化以及多元主体参与的监测网络完善, 并将其纳入顶层设计的整体战略框架, 形成联动互补、动态优化的运行机制。唯

有如此, 方能在实践中逐步打破“唯分数”的路径依赖, 构筑起全链条贯通、全过程覆盖、多元主体共治的评价新生态, 最终实现减轻学生负担、促进其全面而有个性发展的根本目标。

中小学日常考试管理改革并非一项独立的教育政策调整, 而是嵌入于“教育强国”战略整体框架下的系统性制度变迁。考试管理改革的价值实现, 根本上依赖于中考、高考等终端选拔机制的深层变革与协同配合。唯有推动“前端诊断”与“终端选拔”之间形成有机衔接的循环反馈机制, 才能真正消解“表面落实、暗中备战”的双轨困境, 使“以评促教、以评促学”的理念从理想蓝图转化为日常教育教学的常态实践。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日常考试管理的通知[EB/OL]. 2025-12-08.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s3321/202512/t20251216_1423634.html, 2026-06-03.
- [2] 刘继萍. 基础教育评价的教育性反思: 人的异化与回归[J].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报, 2020(3): 105-113.
- [3] 韩晓敏, 孙元涛. 我国基础教育减负政策执行的现实困境与因应路径——基于政策工具的视角[J]. 教育科学研究, 2023(1): 48-56.
- [4] 靳澜涛. 我国教育考试立法的现实困境与应然出路[J]. 中国考试, 2020(12): 59-65.
- [5] 刘太刚, 曾艳清, 余小豆. 需求分化与政策执行的阻力传导——基于教育减负政策执行阻力的扎根分析[J]. 学海, 2022(5): 135-144.
- [6] 梁显平. 制度变迁视角下欧盟 STEM 教育战略演进路径、转向与困境[J]. 比较教育研究, 2025, 47(11): 59-68.
- [7] 余蕊, 阙明坤. 系统论视域下建设教育强国的实践逻辑探赜[J/OL].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报, 1-19.
<https://link.cnki.net/urlid/11.5978.G4.20251205.1522.004>, 2026-06-04.
- [8] 黄巨臣. 农村教育“技术治理”精细化: 表现、局限及其应对——基于协同治理理论的视角[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18, 17(4): 93-99.
- [9] 檀慧玲, 孙一帆. 重构教育评价新生态: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匡正与调和[J]. 中国考试, 2025(4): 1-10.
- [10] 韦伯. 经济与社会: 上卷[M]. 林荣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57-65.
- [11] 刘海峰, 韦骅峰. 招生考试改革的鉴古知今——“唯分数”与“唯升学”问题的历史探究[J]. 教育研究, 2021, 42(5): 86-100.
- [12] 包红岩. 标准分数是教育测量的重要工具[J]. 辽宁教育学院学报, 2000(5): 89-90+96.
- [13] 郭华. 教学的模样[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35-38.
- [14] 程艳霞, 殷新, 王亚兰. 中小学教师教学评价的改革指向与数字化转型[J]. 教学与管理, 2025(24): 103-108.
- [15] 张志红. 校本评价的内涵、挑战及策略探析[J]. 当代教育科学, 2020(3): 46-50.
- [16]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EB/OL]. 2025-01-19.
http://www.moe.gov.cn/jyb_xgk/moe_1777/moe_1778/202501/t20250119_1176193.html, 2026-05-20.
- [17] 李百成, 潘小峰. 重塑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组织边界[J]. 教学与管理, 2025(25): 14-18.
- [18] 王华星. 任务链驱动的小学语文情境化试题四维优化模型的构建与验证——以“校园营养餐”情境题为例[J]. 小学语文教师, 2025(12): 55-58.
- [19] 青岛市招生考试院. 创新应用场景 体现学科素养[EB/OL]. 2025-06-14.
http://edu.qingdao.gov.cn/zksy/zkygzdzs/202506/t20250614_9670795.shtml, 2026-06-03.
- [20] 刘洪祥. 论教师引导者角色的内涵定位及实践优化[J]. 中国教育学报, 2018(3): 74-79.